

8

007134

# 中央研究院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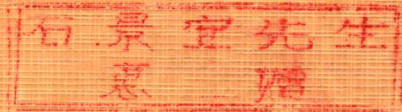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本

第三分

目錄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饒宗頤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	饒宗頤
川南鴉雀苗的神話與傳說.....	管東貴
史記斟證卷七十七.....	王叔岷
史記斟證卷七十八.....	王叔岷
史記斟證卷七十九.....	王叔岷
附載：	
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下篇）.....	李孝定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中華民國 臺北

45.3  
7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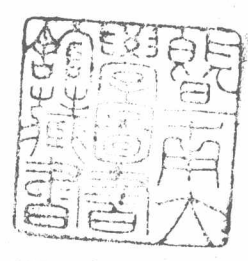
S. 007134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五本

第三分



S9004753

石景宜先生  
惠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五本

第三分

每冊定價新臺幣肆拾元正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中華印刷廠  
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出版

# 中央研究院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 第四十五本

### 第三分

### 目錄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饒宗頤	397—418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	饒宗頤	419—436
川南鴉雀苗的神話與傳說·····	管東貴	437—466
史記斟證卷七十七·····	王叔岷	467—476
史記斟證卷七十八·····	王叔岷	477—494
史記斟證卷七十九·····	王叔岷	495—528
附載：		
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下篇）·····	李孝定	529—560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中華民國 臺北

#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饒宗頤

- |              |             |
|--------------|-------------|
| 一、引言         | 六、武后著述與儒術   |
| 二、武后與佛教      | 七、三教殊英撰述之意義 |
| 三、武后與道教及封禪之典 | 八、略論武周石刻    |
| 四、武后與景教      | 九、結語        |
| 五、武后與明堂      |             |

## 一、引言

唐初人已嗜古碑，唐會要五云：「韓王元嘉愛古碑、古跡，多得異本。」（註①）宋楊文公談苑，記王溥薦何拱爲鳳翔帥，拱思所以報、問溥所欲？溥曰：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版，願悉得見之。拱至，遣督匠摹打，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錄爲琬琰集，凡百卷。」（註②）此事在歐趙以前。是對石刻之愛好和搜集，已不始於宋人。自宋以來，即盛行著錄之事，以貞石證史，衆所熟悉。爲碑誌考據者，校錄文字而外，以考證人名、地名、官名爲多。以一碑作孤立之處理、此爲金石學家之職，非史家之要務也。史家之貢獻，在能提出歷史問題，以碑爲旁證，尋求解答，此以碑證史，與金石家以史證碑不同。

本文以武后之宗教信仰問題爲重點，討論較爲廣泛。可能牽涉武后與佛教、道教及景教，儒術關係等問題。我人或將聯想到陳寅恪先生武曌與佛教一文。該文討論重心有三：一爲武后先世楊隋皇室之佛教信仰，陳先生指出武后受其母楊氏宗教信仰

註① 舊唐書一一五：「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新書七九「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貞觀初，石經已有相承傳拓之本，存在秘府。見封氏聞見記，現存於巴之溫泉銘拓本末，有永徽年號一行，可能即現存最早之唐拓。唐代宏文館、崇文館均設有攝書手，故知碑拓之蒐集，唐初已盛行之。

註② 羅振玉昭陵碑錄前記已引此事。

之薰習。二爲武后以佛教爲符讖，又證明大雲經非偽造。其三從唐人詔令看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關於第一點，陳先生據蕭暉傳，及外戚楊仁恭傳與廣弘明集等資料，證明楊氏必爲篤信佛教之人物。按陳先生全未利用石刻材料，故求證十分辛苦。其實武后母氏生平，有武三思撰相王旦所書之順陵碑，長達四千餘言（長安二年六月立）。顧炎武求古錄及孫星衍續古文苑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四十五已錄其全文，羅振玉亦有校正本，載石交錄卷四，文敘楊氏先世及其信佛經過甚詳。又武后在嵩山少林寺永淳二年九月王知敬書之御製詩書碑云：「從駕幸少林寺，觀先妃營建之所，逾悽遠慕。」詩中已有「金輪轉金地，香閣曳香衣」之句，後來於長壽二年加號「金輪」，此時經已先用是語，形諸吟詠。唐高宗晚年兩度幸嵩山，一在調露二年，一爲永淳二年，此詩卽是時從幸所作。后母楊氏以咸亨元年八月薨，年九十有二，加贈太原王妃，故詩稱曰先妃。楊氏在少林寺有所營建。后見後甚爲感動。武后之信佛及以後對佛教興造寺像，謂與母氏有關，自不成問題。又隋楊氏與佛教淵源，見于碑刻者又不少。如大業三年栖岩道場舍利塔碑（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卽陳文中所述「其栖岩寺卽是太祖元武皇帝之所建造者」，均有碑可證。至蕭暉信佛事，見於濟度寺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法樂爲瑀之長女，自幼出家。（李宗蓮寶帳精舍金石跋）。見於龍朔三年尼法願墓志（金石萃編五十四），法願則瑀之第三女。蕭氏一家對佛教信奉之篤，雖經太宗之反對，其女削髮爲尼者，不止一人。可見蕭氏家庭信佛之程度，賴有碑刻可以見之。凡此可補陳先生文中所未及。

因鑒于陳先生於石刻資料未加利用，本人讀碑之餘，對武后宗教信仰問題，深感興趣，由石刻領會到，有一些不同看法。

- ① 武后之宗教信仰，前後有極大轉變，在其與薛懷義接近時期，由於利用佛教，而崇信佛教。及至晚年常遊幸嵩山，則興趣轉移于道教。
- ② 雖于天授二年頒布釋教先道之制，但此爲一時之舉。后欲造巨大佛像亦因人諫阻而中止。後來大雲寺亦且改回原名，稱「仁壽寺」。
- ③ 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動，如嵩山封禪之類，乃承接高宗之遺軌。又明堂之制，則隋以來各皇帝未完成之鴻業。天樞之立，集萬國蕃長落成之，則又天可汗精神之表現。

以下將利用碑誌，加以詳細討論。

## 二、武后與佛教

舊書則天紀「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于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撥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七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二年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按此天授二年制中有「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禎祥；方(等)發揚，顯自在之丕業。……爰開革命之階，……以申自我之規。」借用釋氏辭句，作爲符應之憑藉。以大雲經中「即以女身爲王國土」爲女子稱帝之理論根據。大雲經非爲偽造，只可說是偽託。武后登位之過程，先是於垂拱四年，由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獲之洛水，號其石曰寶圖。五月，則天由皇太后加尊號曰聖母神皇。七月，改寶圖爲天授聖圖。十二月，神皇拜洛水，受天授聖圖，勒石曰天授聖圖之表。及革唐命，改國號曰周，改元爲天授。天授一名，即由洛水之天授聖圖而來。此一製造符應而登極之辛苦歷程，與王莽時哀章等上金匱而即真完全相似。登位手段主要仍是採取傳統符應之舊式方法(註③)，大雲經僅是輔助手段而已。據新書武后傳「載初中，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群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宋敏求長安志「武太后初，光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註④)則稱寺名曰「大雲經寺」。此一幕趣劇當然出於薛懷義及僧徒所策劃，舊書二三七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徵。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按懷義傳稱『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合懷義恰爲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其偽大雲經頒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據此，諸沙門亦援彌勒下生經立說。與隋時之彌勒教及後來之白蓮教無異。則此諸僧必有淨土宗者流。(增一阿含第四十二品言彌勒)

註③ 武后革命，實出武承嗣之謀，新書二〇六承嗣傳云：「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

註④ 見經訓堂叢書本長安志卷十南懷遠坊，東南隅大雲經寺條下註。

###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應三十劫成無上正真等覺。法住記述彌勒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隋部洲廣博嚴淨。」此為彌勒下生作圖浮提主之根據。東晉釋道安於彌勒前立誓，北魏太和始造彌勒像。齊傳大士自稱係彌勒菩薩分身世界，濟度眾生。隋時宋子賢及桑門向海明均自稱彌勒佛出世。（隋書五行志）法明等持此為說，亦卑之無甚高論。）

舊書姚璩（令璋，思廉孫）傳：「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璩為督作使。聖證初，璩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按在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璩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與散壞。觀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為得也。』（按竺法護譯。）則天乃依璩奏，先令璩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又舊書二十六禮志：（明堂既災）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時，有天魔燒宮，七寶樓臺須與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即針對姚璩之奏，可見當時大臣亦以則天比之彌勒下生。雖明堂之火，亦借彌勒為詞，豈不可笑！

又新書武后傳：「時春官尚書李思文復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頒示天下。」可見其時言受命符應之多，僧徒之表上大雲經，特其一端而已。但當時有反對之者，新書一〇二岑長倩傳：「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長倩是岑文本從子，因反對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及大雲經事而被斬于市。岑是此一事之犧牲者，茲特為之表彰。舊書不載此事，新舊唐書合鈔引新書「和州浮屠上大雲經」句補之。按諸僧皆洛陽大德，和州二字必誤。舊書本紀云：「殺豫章王竇，遷其父舒王元名于和州。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此處和州乃新書涉上文舒王之貶所而誤讀，故以為「和州浮屠。」地理志和州屬淮南道，有和州歷陽郡，與洛陽無關，附為訂正。

徐松兩京城坊考錄自長安志，均稱「大雲經寺」；考之碑刻，但作「大雲寺」，無「經」字，如：

⊖ 而禘（天授）二年，大雲寺彌勒重閣碑 杜登撰（見山右石刻叢編五）。前有一行「大周大雲寺奉為聖神皇帝敬造溫（涅）槃變碑像一區」。碑在山西猗氏縣仁壽寺。

⊖ 大足元年辛丑建大雲寺之口文，賈應福撰書，太原武盡禮（武后族屬）勒上，額題「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碑長二千餘字，多殘泐，見金石萃編64，碑在河南河



內，原爲隋之長壽寺。

天授碑末又一行「而稽二垂二②二十四②准制置大雲寺，至三年丑（正）②十八②准制迴換額爲仁壽寺」。是至翌年，大雲寺已可換額回復舊稱。獲鹿縣本願寺心經周長安時石幢，末行有恒州大雲寺□道僧慧……」字樣（見沈瀟常山貞石志七）。所有石刻均作「大雲寺」，不稱「大雲經寺」。唐會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爲開元寺」。後來開元寺固由大雲寺所改名，然山西猗氏之大雲寺，天授三年即已准復原稱仁壽寺，且著之於碑文矣。

集古錄載有「長安二年司刑寺大脚跡敕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金石錄後碑范元極撰）歐公謂「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時之盛也，視朝隱寺碑銘可見矣。」惜原文不可畢觀。至于造佛像之事，明堂既成，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據謂懷義刺膝血爲之。佛像小指甲猶可容數十人，其大可知。及懷義火燒天堂延及明堂，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

后又欲于洛陽北邙山造白司馬坂巨佛大像，當日諫諍者有狄仁傑、李嶠（新書一二三嶠傳）張庭珪（舊書一五二廷珪傳）多人（參唐會要四九），乃罷其役。張庭珪于後來中宗神龍時諫白馬坂營大像第二表云：

「天后朝，懷義營大像，并造天堂安置，令王宏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凡所營構，并爲災火。懷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

關於建白司馬坂巨佛像事，日人松本文三郎考證甚詳（則天武后の白馬坂大像に就いて，東方學報，京都5）。自懷義寵衰被誅，武后對佛像營建已不如前之熱心，亦接納群臣之諫。新書二二五蘇瓌傳：「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蘇瓌以爲糜損浩廣。……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聖曆元年正月頒制：「佛道二教，同歸于善，無爲究竟，皆是一宗。」對二教已無輕重之別。可見後來后對佛教之信仰已衰，未能貫徹到底。由是觀之，武后不得謂爲佛教之真正信徒。

武后臣下，如前營繕大匠王瓚，于長安三年七月，有石龕阿彌陀像銘（藝編六十五）。姚元之有長安三年九月造像記（藝編六十五），然元之（註①）後來反對佛教最爲劇烈。新

註① 唐書姚崇傳，字元之，長安四年九月以後始稱元之。

書姚崇傳，對玄宗請絕佛道營建。又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崇又戒子孫令云：「抄經鑄像之無益，緣死喪、造經像以追福，兒曹慎不得爲。」似有鑒于武氏之失，此是一種覺醒。

### 三、武后與道教及封禪之典

泰山封禪之典，高宗時已舉行。舊書：「高宗麟德二年十月戊午皇后請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遂上疏請封禪。三年春正月戊辰，車駕至泰山，己巳，帝昇山行封禪之禮，改元乾封。兗州界置紫雲、仙鶴、萬歲觀、封巒、非烟、重輪三寺，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因至泰山，遂命附近亦置道觀。

高宗封禪之舉，實出天后所請。金石錄有白鶴觀碑，中宗時立。然山西長子縣有白鶴觀碑，文中有云：「白鶴觀者，垂拱二年之所立也」。又云：「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建此豐碑，旌以功德。」則碑琢于武后時，而追樹于中宗之後。（山右石刻叢編5）武后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舊書承禎傳：（承禎）「師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止于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于洛橋之東。」嵩山老君洞有王適撰序，司馬承禎書之潘尊師碣，題「弟子中巖道士獄（司）馬（馬） 𪔐（稽文字） 𪔐（微。出碧落文）書，（子微即承禎之字）此潘尊師（師正）碣，大周聖（聖）曆二年己亥二月立。舊書隱逸傳潘師正師事王遠知，居于嵩山之逍遙谷。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尋勅所司于師正所居造崇唐觀。（雲笈七籤載勅置奉天觀，令于逍遙谷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見玉海卷一百「唐太一觀」。）舊書高宗紀：調露二年二月丁巳，至少室山，賜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諡曰昇真先生。己未，幸嵩陽觀及啓母廟並命立碑。（按此碑崔融撰，沮渠智烈書）又幸逍遙谷道士潘師正所居。永淳元年秋七月己亥，造奉天宮于嵩山之陽，二年正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岳、少室。」此碣記永淳元年正月乙未，帝駕幸奉天上謁虛室。（本紀作二年，誤）又記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之眷問，有云：

神皇雅尚僊圖，永懷祕訣。每洒心咨道，探蹟求真，帝步景于青元，想餐霞于紫府。嘗致書曰：九宮神祕，顯已通其大綱，太一紫房，猶未解其深旨。尊師微言虛答，秘世莫聞。

尊師卒于永淳元年，年八十九，時后猶爲天后也。

舊書武后紀證聖元年，加尊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碣稱武后，用此尊號），改元爲天册萬歲，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丁亥禱于少室山。二年癸巳，至自嵩嶽。春一月重造明堂成，改元爲萬歲通天。」是時武后屢嘗駕幸嵩山。故司馬子微特爲其先師潘師正立碣。潘尊師與高宗及武后交誼之深，于此可以見之。

自此以後，武后活動多在嵩山地區，舊書后紀：「聖曆二年（二月）戊子，幸嵩山過王子晉廟，丙申幸緱山。丁酉至自嵩山。三年正月造三陽宮于嵩山。四月戊申幸三陽宮。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復，改元爲久視，停「金輪」等尊號。大足元年夏五月，幸三陽宮，七月甲戌至自三陽宮。」此時期中，后已醉心道術，即向取自佛家之金輪尊號亦復停用，而改采道德經長生久視爲年號，說嵩云：「聖曆二年，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身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厚賞之。」（事見舊書二五〇文苑本傳）其媚主卑躬，令人失笑。后末年多病，改事道教，冀求長生，亦非偶然。

新書二〇六武三思傳云：「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分卿歌咏淫汙，覷然媚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羣不肖，即建營三陽宮于嵩山，與泰宮于萬壽山，請太后臨幸，已與二張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是嵩山之營建，殆出于三思之計謀。（聖曆二年，置控鶴府，以張易之爲控鶴監，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員半千等爲奉宸供奉，諛者謂昌宗是王子晉後身。按控鶴二字，出自神仙家言。孫登天臺賦：「王喬控鶴以冲天」，蓋丹家飛升之常語，借以爲喻。）此時期之石刻，重要者有下列各碑：

- ① 萬歲登封元年正月，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相王且正書。已毀。
- ②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封中嶽碑，薛稷正書。目見金石錄。
- ③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即天册萬歲二年），封祀壇碑，梁王（武）三思撰，薛曜書。（據金石文字記）在登封縣西萬羊岡。下截剝蝕。
- ④ 聖曆二年六月，昇仙太子碑，題「大周天册金輪聖神皇帝御製書」聖曆二年己亥六匝甲申朔建。碑陰御製遊仙篇，薛曜書及諸臣名銜。按此與潘尊師碣同年所立，潘碣立于二月。碑在偃師縣南二十里府店緱氏山仙君廟。

⑤ 久視元年五月，夏日遊石淙詩碑，御製薛曜書。在嵩山石淙北崖上。

⑥ 大足元年五月，秋日宴石淙序，（顧炎武謂張易之撰）在嵩山石淙南崖。

舊書禮儀志：「高宗既封泰山，又欲遍封五岳。……永淳二年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于嵩岳，詳定儀注，于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尋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垂拱四年將有事于嵩山。……至天冊萬歲元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改元萬歲登封。三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則天封于嵩山，即本高宗遺志，壇制亦沿高宗詳定之規而行之。禮儀志于禮畢之後，載有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于壇之丙地。按「升中」取覲禮「祭山丘陵升」「因名山升中于天」之語。嵩高為地之中，故取為名，以碑述志，古所罕見，足見后襟抱之大。高宗封禪之事，實由后所請，至是卒告成功，故泐碑記之。

金石錄有「道藏經序碑」高宗則天撰，王懸河行書。弘道元年十二月。（參六藝之一錄卷八十）是天皇、天后嘗出名為道藏製序，可見其向來對道教之尊重。武后御製昇仙太子碑長文，據文中「敬陳嚴配之典，用展禋宗之儀」實指登封之禮。舊書禮儀志：「丁亥，禪于少室山，己丑，御朝覲壇，朝羣臣。（案武后見崔融啟母廟碑文，嘉之，命作朝覲壇記，詔刻碑。則天封中岳，（員）半千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見舊書文苑傳。）則天以封禪日為嵩岳神祇所祐。遂封神岳天中王為神岳天中皇帝。……王子晉亦被封為昇仙太子。王昶謂武氏之先出自姬周，周家之昇化者有子晉，因而崇奉之。碑云：『山鳴鸞鷟，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圖書，式兆興王之運，」可證也。至于附會張昌宗事，以昌宗為王子晉後身，雖出武三思言，然為久視元年以後之事，昇仙立廟不得謂因昌宗而作。」其說甚是。碑陰御製遊仙篇中有「仙儲本□諒難求，靈迹奇術秘玄猷，願□丹□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竟欲求長生之藥，是時后之心情，與稱金輪尊號時，已大不相同，後來果用「久視」二字以為年號，及久視元年，夏日遊石淙御製詩并序，有云「幽栖無滯，泉石不孤，髣髴崑閩之境」。應制和作者，自皇太子以下十六人。狄仁傑句「老臣預陪縣圃宴，餘年方共赤松遊」，全作神仙家言。可見晚年之武后，在嵩山遊幸中，其精神已完全陶醉于道教之中矣。

自高宗封泰山後，泰山地位益崇，顯慶六年，儀鳳三年皆嘗建醮於泰山東南麓王母池之岱嶽觀。其後天授二年、萬歲通天二年、聖曆元年、久視二年、長安元年、四

年，均有道士建醮造像之記。後來各代，皆於此磨崖爲記，至建中而止。碑凡二，上施石蓋，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如長安四年文略云：「設醮奏章，投龍薦璧，以本命鎮綵物，奉爲皇帝敬造石天尊皇上天尊一鋪十事□壁畫天尊一鋪十三事，敬寫本際經一部，度人經十卷，欲茲功德，奉福聖躬。」是時武后多疾，故勅道士爲祈壽。至寫本際經事，今敦煌石窟所出本際經殘卷，不少爲武后時物，有大周年號，英法均有之。

#### 四、武后與景教

武后與景教本絕無關係。惟波斯阿羅憾誌銘中云：「又爲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及諸軍立功，非其一也。」事在長壽三年八月，其年五月，改元延載。（舊書繫於是年八月，新書在聖歲證聖元年四月，明堂災後，蓋指完成之時，由舊書姚璩傳可以證之。）

羅香林先生撰「景教徒阿羅憾爲武則天皇后營造頌德天樞考」（清華學報新卷三期），又收入所著唐元二代之景教書中。以爲天樞之造，出於景教徒之手。

按唐室接受波斯教入華傳教，已始於太宗貞觀時准許波斯僧阿羅本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唐會要四九，又見陸心源全唐文拾遺一）。此唐人立國之涵蓋精神，異教均加寬容，絕不排斥之原則，太宗之遺訓也。關於天樞另外一石刻極重要材料，而羅先生所未引者，爲泉獻誠墓誌，稱「天授（按天授。疑有誤。應在延載元年，或證聖元年）二年二月，奉勅充檢校天樞子來使」（參羅振玉跋，後丁戊稿 p. 45）泉獻誠爲高麗蓋蘇文孫，泉男生之子，於高宗時歸附。新書一一十有傳，稱：「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所謂「天樞子來使」必臨時之職，「子來」即庶民子來之意。天樞之建，旨在頌武周功德，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共爲之，其時納言姚璩實董其役，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于其上，武三思爲文，武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註⑥）所以示四海攸同，萬邦各教，其子民罔不來朝。天樞建成之日，東而高麗臣服之人，西至大秦波

註⑥ 波斯阿羅憾墓誌，見羅氏芒洛遺文。參羽田亨史學論文集下卷，P.385。

泉獻誠墓誌亦見羅氏海東藩閩誌存

天樞事又詳太平廣記 240 引大唐新話，見續唐詩話李休烈條，唐詩紀事，全唐詩譜門同。

斯傳教之士，無不贊襄其事。故云召諸蕃王，共建造之。佛教、景教均在我后化育之下，此事與高宗乾陵之下葬，諸蕃來助之情形相同，不得單獨歸功于景教徒。

武后撰中宗書之述聖記碑，即述高宗聖德。碑立于乾陵。王昶云：「宋敏求長安志：乾陵在奉天縣西北五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即來齋金石考略所稱，碑石來自于闐者也。來齋又云：此碑填以金屑，照耀陵園。據宋趙楷記稱乾陵之葬，諸蕃來助者衆，武后欲張大誇示來世，于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各有其形，可見當時乾陵規模，異乎常制。宜乎此碑之金屑照耀也。」于陵前立述政記，有如墓表，與高宗爲太子宏撰叙德記爲同一例。（萃編六十）

天樞之鑄諸蕃名字，亦同此制。武則天以神皇、天后之尊，君臨萬國，此即天可汗之精神，自太宗、高宗以來，至武后而更充分加以發揮者也。

## 五、武后與明堂

舊書則天本紀：「垂拱四年春二月，毀乾元殿，就地造明堂。」新書武后傳：「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又度明堂後爲天堂。」舊書：十二月「還宮，明堂成。」新書同紀云：「辛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其後每年于春正月必親祀明堂。證聖元年正月丙申，明堂災。考明堂之制，自隋以來即謀恢復，至武后乃完成之。隋書六十八字文愷傳：「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書，奏明堂議表。」極爲詳博。會有遼東之役，事不果行，舊書：「唐高宗麟德三年正月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彌更訛解。遂增古今，新制其圖。」是高宗已有新制之明堂圖。舊書禮儀志二備載當日之詔，其具製廣狹甚悉。又稱則天臨朝，儒者屢上書言請創明堂。（如員半千即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見舊書文苑傳）則天以高宗遺意與北門學者（指元萬頃輩）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五月明堂成。凡高294尺，四方各300尺，分三層，上層法廿四氣，中層法十二辰，下層象四時，又于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此武后明堂之規模也。

新書禮樂志三：「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爲之。……乃下詔率竟班其制

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鸛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是明堂之建，高宗已下最大決心，至分長安 萬年置乾 封 明堂兩縣，分理于京城之中。武后明堂，正是承接高宗遺旨而實行之。石刻中有唐明堂令于大猷碑，在陝西三原縣北。大猷爲于志寧之孫，立政之子。碑前云：「其惟明堂縣令東海于公」。後云「聖曆二年，制除雍州明堂縣令。」據新書地志 明堂縣在長安二年始省併于萬年（寰宇記云「二年六月」舊書作三年廢）。大猷即于未省併前任明堂縣令。證聖二年一月，重造明堂成，改元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復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前。新書后傳：「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唐會要十一：「武后立九鼎，有圖畫，尙方署令曹元廓圖之。武后自製曳鼎歌詞。」封氏聞見記，載武后九鼎，都用銅共560712萬斤，其豫州之鼎最高達一丈八尺（餘九州鼎高一丈四尺）。以豫州爲天下之中故也。大抵武后作明堂、九鼎，皆取自傳統觀念，以誇耀其成功而已。

## 六、武后著述與儒術

舊書則天皇后紀：「太后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玄覽。及古今內範各百卷，青宮紀要，少陽政範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誠、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內軌要略，樂書要錄各十卷，百寮新誠，兆人本業各五卷，臣範兩卷，垂拱格四卷，並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閣。」

新書武后傳，高宗末年與后共稱二聖。「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撰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可見后在高宗季年，乃篤志于儒術。從其早期著述，可窺見其原來思想之一斑。其著作見于兩唐書經籍藝文志者，子、集各部均有之，尤以儒家類爲多，今不備列。

武后又撰字海一百卷，新書注云：「凡武后所著，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敬業等撰。」按此指所謂北門學士，新書文藝上元萬頃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左史范履冰等撰刊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九千餘篇。」（乾隆四年刊本）按后傳作千餘篇（舊書文苑萬頃傳作凡千餘篇。新書九字乃「凡」之誤。）

惟臣軌尚存。

唐會要三六「垂拱二年太后撰百寮新誠及兆人本業記。」玉海二十八：「凡武后書皆元萬頃等撰。」

今敦煌所出有P5523號卷，寫于武后時。王重民爲題作「天訓」，予則疑是武后訓記雜載十卷中之文。（唐書藝文志子部武后訓記雜載十卷，註云采青宮紀要，維城典訓，古今內範，內範要略等書爲雜載云。）

武后早期本崇尚儒術，其能取得一般文士所擁戴者，此未始不爲主要之原因。

## 七、三教珠英撰述之意義

舊唐書禮儀志二：「（載初二年）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武后開國之初，即於明堂舉行三教講論。」新書一〇四張昌宗傳：「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

聖曆元年元月，頒條流佛道二教制云：「佛道二教，同歸于善，無爲、究竟，皆是一宗。……自今僧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唐大詔令集——三）已視佛道爲一家，惟至睿宗景雲二年，始制僧、道齊行並進。（同集同卷）

唐會要：「大足元年，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預修者四七人。」此四七人即所謂「珠英學士」者也。巴黎P3771及英倫P2714即是珠英學士集殘卷，存五十一行。文獻通考經籍考有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此書元時尚存。新書文藝李適傳「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又富嘉謨傳：「與吳少微號吳富體，預修三教珠英。」新書一一四徐彥伯傳：「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徐）彥伯、李嶠居首。」又一一五朱敬則傳：「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以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三教珠英，爲書一千三百卷，煌煌巨帙，參加其事者，據會要所記共四十七人，主要分子二十六人。從其書名稱曰「三教」觀之，必是選錄儒、道、釋三教有關之詩文，張昌宗負責編纂，會通三教以成書，可見武后自始至終即有混合三教之傾向，有如梁武後期之思想。故以三教爲書名，可惜此書今已失傳，無從窺測其內容，然武后之宗教思



想後來愈趨向于綜合方面，一此巨著無疑地正是重要之證明。

## 八、畧論武周石刻

清人注意武周石刻者，首推顧炎武（求古錄中錄岱岳觀雙碑及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全文）。其金石文字記著錄武后有關之碑，自永淳二年天后御製詩碑，垂拱二年王徽君臨終口授銘，訖上騎都尉相景瑞碑，共廿二事，可謂有識。

葉昌熾語石，記其所見武周碑，不下數百通。邊遠之地，文教隔絕，而碑刻記年月，皆周武后新製之字，點畫不差累黍。（西如燉煌之柱國李公舊龕碑，南至廣西上林三畔嶺之慶州刺史章敬翀智城碑，雲南昆陽之王仁求碑，皆然。）葉氏於清季到陝西，所撰邠州石刻錄，其中收武周石刻獨多，共十四事。而張維隴右石刻錄、羅叔言西陲石刻錄收武周三碑及續出一碑。然其中有重刻者，如武威之大雲寺碑，首行題「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竟用明代衛名（見張維書）。近年墓誌出土特多，屬於武周時代者，北平圖書館墓誌目及羅氏墓誌目所著錄，可見其概。墓誌中以張柬之一家為重要。唐會要七六：「證聖元年張漪及第。」張漪為張柬之之子，詳襄陽所出張氏一家九墓誌，（註⑦）羅振玉已輯為襄陽冢墓遺文一書。章懷太子賢廢死于巴州，在武后嗣聖元年三月。邵王李重潤及永泰郡主婿武延基（承嗣之子）為張易之讒構，令自死，事在武后大足元年九月。近年來章懷墓及懿德太子（重潤）、永泰公主墓先後出土，三墓皆陪葬墓。李賢及妃房氏有墓誌二，此皆最新之材料。武后時，嘗禁立碑，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故周時德政碑一類絕少，（註⑧）此事至中唐而復盛。

史書中往往記立碑事，散見各篇，未有輯錄之者。中央圖書館藏清毗陵陸雅浦諸史碑銘錄一本手稿未刊。但僅錄晉書元魏、新舊五代史部分，令人失望。現存古碑，為數無多，故已佚之碑目，對於考史亦有絕大幫助。

武周時碑刻，以嵩山地區而論，據康熙間嵩人景日珍所作說嵩一書卷十四金石類，又有下列各碑，為上所未舉者：

註⑦ 參李宗蓮懷帳精舍跋尾中襄陽張氏九墓誌跋。

註⑧ 本所藏 00934 號為唐宣州刺史陶大德政碑，僧靈敏撰，陶德凱正書，在安徽當塗。永昌元年三月十三日立。即一例外。